

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实验教育研究

罗 玲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作为教育中枢的教育部与各教育研究团体、专科及其以上学校也先后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为适应国难时局,云集于大后方的教育家,将各类新教育理念与“教育救国”思想相结合,在大后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实验教育,并卓有成效,重庆也由此成为国统区实验教育中心。考察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开展的基本概况,不仅可以揭示政治变迁与教育改革的关系,还可以丰富近代教育史研究,对我国现有深化教育改革及教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实验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5-0042-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505

实验教育理论为近代重要教育理论之一,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相关实验活动值得深入研究。学界对战时大后方教育研究多集中于专科及其以上学校的内迁办学史,以及社会教育、民众教育、乡村教育诸方面。由于资料收集困难,学界对这一时期在大后方推行的实验教育的研究与关注较少,现有文章侧重于对个别实验团体、机构,抑或个别教育家诸如晏阳初、陶行知等人教育理念的梳理和史实回顾,如《华西实验区卫生建设研究》^[1]《抗战后乡村建设的复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研究》^[2]等论文,对华西实验区的卫生与乡村教育展开了讨论,但对于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总体情况的研究尚未展开。本文考察教育部与各教育机构在战时大后方开展实验教育的基本概况,以探讨回顾近代中国实验教育发展的历程,总结其成效与不足、经验与教训,不仅可以丰富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对现有教育改革及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加强当前各级各类教育建设并以此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具有现实意义。

一、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的缘起

实验教育学是一种以教育实验为标志的教育思潮,它于20世纪早期产生于德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内传统的封建教育及其思想受到了空前猛烈的抨击。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西方各类教育新思潮、教育改革实验纷至沓来,包括狄尔泰、斯普朗格、利特等的文化教育学,杜威、克伯屈等的实用主义教育学,乌里、A·瓦斯凯的制度教育学,家里宁、凯洛夫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鲍尔斯、阿普尔、布迪尔等

收稿日期:2024-06-11

作者简介:罗玲,女,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从事抗战史与中国教育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民国政府教育部研究”(20BZS077)。

的批判教育学,德国的梅伊曼和赖伊(拉伊)实验教育学^{[3]39}。其中,实验教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教育界,并在战时大后方得到了充分实践。

(一) 实验教育理论的提出及内涵

实验教育理论产生于近代自然科学实验,其从物理学、化学的范围应用到生物学和生理学,并取得较大成效,再应用到心理学和医学。随后,医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曾经依照这种原则受过训练的教师,便想到应用实验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儿童身心的发展和教育上的问题。1901年,德国教育家梅伊曼首先将实验教育思想称为“实验教育学”。1910年,德国教育家赖伊的《实验教育学》发行第三版,其中系统阐释了实验教育思想,初步具备教育学体系。梅伊曼与赖伊的研究引发了广泛响应,越来越多的教育学家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密切关注,实验教育思潮风行一时,并迅速扩展影响到欧美主要国家,从而形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教育实验热潮^{[4]147}。实验教育学家提倡把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应用于教育研究;主张用实验、统计、比较的方法探索儿童心理发展过程及其智力发展水平;用实验数据作为改革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依据。其主要特征在于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用科学的统计以及客观系统的观察来解决教学和教育上的问题,观察实验对象在教育过程中的发展、变化特点,并据此揭示教育原理,确立教育原则,实现在教学和教育上应用新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实验的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在教育上的应用实验。

(二) 实验教育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

20世纪20年代,实验教育理论随着留学生的归国及各类实验教育书刊的翻译出版,在国内教育界逐渐传播开来。介绍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廷光、王秀南、金澍荣、黄觉民等人。“经教育界之努力,实验教育之呼声逐渐成为有力呐喊。”^{[5]1}1922年,东南大学附中实行道尔顿制,开创了实验教育先河。随后,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也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验^{[5]210}。此外,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也建立了各类实验中小学。这些实验中小学的广泛创立,是教育界对教育实验的较早尝试,尽管该时期的教育实验仅限于对学校教育及教学方法的实验。

从1922至1925年间,平民学校遍及国内各地。1926年起,晏阳初建立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开展平民教育实验工作。同时,各大学与相关机构也纷纷推行各类教育研究与试验,如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燕京大学社会系、苏州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分别努力于民众生产技能之获得,与知识之进步”^[6]。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创办教育学研究所,着眼于缩短小学修业年限研究实验,该所的成立,为近代中国教育研究机构创立的重要标志。之后,无锡教育学院从事社会教育试验,大夏大学着重编纂实验教育资料,并搜集相关教育著作,“国立中央大学”与清华大学以心理实验与统计著名,实验教育“这种蓬蓬勃勃的生气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瑰宝”^[7]。随着各大学教育实验所的设立,学者对教育实验的推进与研究,表明教育界对实验教育有了广泛的关注与了解。1933年,国内出现了实验教育的最早刊物——《实验教育》。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多项关于学术研究及其机构的法规,教育研究机构也因此获得了相关的制度保障,实验教育也走上了正规化的发展道路,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结束,其工作方告停顿。

(三) 各实验教育机构云集大后方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积极推进各类实验教育,组织初等教育实验研究辅导委员会,旨在“依照科学方法,主持处理全国初等教育之实验研究事项,藉使初等教育逐渐改进”^[8]。在教育部推动下,各教育机构纷纷从事实验教育。由此,大后方实验教育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1938年夏,西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添设师范科研究所教育心理学部与教育学部^{[9]40},从事各类研究与实验。其在军警心理研究、大中小学生心理研究、实业心理研究、学习心理研究等方面都有丰富的收获^[10]。1940年,教育部筹设“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以培养社会教育人才,研究社会教育

学术^[11]。该院设有研究部,“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教育相关理论与实施,从事社会教育学术研究,探讨社会教育实施方法”^[12]。该院还设乡村教育实验区、国民教育实验区、民众教育馆、实验巡回施教队,从事各项社会实验工作^[13]。“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为其时全国唯一的最高社会教育人才训练与学术研究机关,为“我国教育史上之创举,以培养社会教育专门人材,研究社会教育高深学术为任务”^{[14]480}。1940年9月,当局在江津白沙设立“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该院为国统区唯一培养女子师资所设最高实验学府,设七系及三个专修科^{[15]280}。1939年,四川省教育厅成立教育科学馆。该馆除对日常各类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调查及实验外,还负测验统计、教育调查、设计和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实验和编辑、推广工作。其自身定位为“对政府为教育学术与行政之咨询机关,对本身为教育学术与行政之研究机关,对全省各级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为辅导机关”^[16]。

其时,私立的实验教育研究机构有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等。邵爽秋创办的民生建设实验院,抗战爆发后设于重庆鱼洞溪。其主旨为实验适于民生建设的教育制度,应用实验结果以协助完成中国民生建设。此外,晏阳初于1940年在重庆北碚创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培养乡村人才的高等学校。

为适应战时环境,全方位推行战时实验教育,当局也在大后方设立各种实验教育机构,开展各类教学实验。如异军突起的“学生营”与社会教育工作队以及民众教育馆。教育部先后在重庆、康定等地设立“学生营”。作为战时新型教育机构,学生营不以校政机关为主体,不以固定校舍为限制,通过一面授予基本课程,一面指导实际服务,以求“知行”与“学用”合一^[17]。当局先后在后方各地设立社会教育工作团、巡回戏剧教育队、实验巡回歌咏团及巡回施教队等社教工作队。社会教育工作团主要进行民教制度实验、民校教材的研究和民教方法检讨等。实验巡回歌咏团及巡回施教队,在大后方各省巡回施教以普及民众教育。其还曾先后组设戏剧教育队及实验教育队,在各省重要城镇巡回上演^[18]。各队分为总务、宣传、教育、研究四组,教育组负责抗战常识训练班,研究组进行各种访问、调查及搜集编撰民间的文艺^[19]。此外,当局于1939年筹设青木关民众教育馆,1941年更名为实验民众教育馆^[20]。该馆担负示范并辅导全国各地民众教育馆之责,成效显著。“历年研究实验成绩深获全国社教人士称许,辅导川东南各县(市)民众教育馆,淬励社会教育事业之改进。”^{[14]851}

由上可知,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实验教育机构数量大幅增加,类型呈多元化趋势,体现了近代中国实验教育研究机构的拓展。实施实验教育的机构主要有教育部、专科及其以上学校、教育研究所或师范研究所、各省市科学馆、民众教育馆,还有部分私立教育研究团体,这些机构不仅实施学校实验教育,还关注社会教育与民众教育的实验。这不仅有利于教育实验工作的开展,还保证了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际工作有效的结合。再现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与其时中国教育实际的逐步融汇、其时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逐步结合的过程,为近代中国实验教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这既是教育研究本土化、科学化的进程,也是其专门化、制度化的进程,从而构成中国近代实验教育与教育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教育学术化建设的进程。

二、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的实施与成效

在教育部助推下,大后方各教育学术机构,根据其宗旨与任务,结合战时环境与大后方实际,积极开展各类教育实验,力求解决各类新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一) 各教育实验区的擘画与分布

为有效推进各类教育,在分析研究教育新发展和深入调研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当局与各机关团体先后在大后方各地设置国民教育实验区、社会教育实验区、家庭教育实验区、边疆教育实验区等各类教育实验区,以推广示范各类教育实验。

为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当局先后在大后方设置各级国民教育实验区。1940年,在第二届师范教育会议上,决议各师范学院对于国民教育问题应切实研究实验^[21]。随后,当局在重庆设立国民教育实验示范区,各大学与教育团体也在大后方各地办起了各类国民教育实验区。豫、甘、川、粤、鄂、闽、滇、黔、桂、赣、康、宁、渝等十三省市均成立了国民教育实验区,实施国民教育研究、实验及辅导与从事政治、文化、经济、保卫方面的实验^{[22]293-357}。重庆教育局也在沙磁区、南岸等地设置了多个实验示范区,负责办理国民教育研究实验及推广。实验区以实验各项国民教育新政、国民教育新教学法为目标,实验“国民教育各项法令在实施中所产生的困难问题及其解决方法”^[23],辅导地方教育及自治人员,寻求经济文化建设最有效办法,以促国民教育的普及。

当局也在重庆各地建立社会教育实验区,在实验区内设实验民众学校、实验补习学校、实验民众教育馆等社会教育机关,“实验普及基本教育,发展国民经济,助成民主政治,而尤重乡村基层之建设,以及成人教育之设施”^[24]。1942年,当局在重庆设立中央民众教育馆,从事民众实习教育实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实验、扫除文盲与社会教育教材教法,以及民众学校教育制度等问题的实验。国民教育实验区的设立,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层合流,以实验国民教育各项法令在实施中所发生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法^[25]。1941年3月间,当局指定“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承办第一家庭教育实验区,研究并试验实施家庭教育的有效办法。以重庆江津白沙镇为范围,成立若干妇女教育班,民众书报阅览室、民众问事处等机构^{[14]436}。“国立社会学院”成立后,以璧山县城东乡为家庭教育实验区和推广区。家庭教育实验区的设置,有效配合了大后方各地社会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开展。

教育实验区主要解决实验教育如何与其他机构统筹与协调的问题,通过发动各类社会团体和民众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政策保障、经费保障、资源保障等实验教育保障机制。这些教育实验区对实验教育工作有引领和辐射效应,能为实验教育提供框架、推广和普及。在教育实验区推进的过程中,也可根据各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发展状况,决定各地实验教育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和教育内容,开展贴近民众、多形式、多层次的教育实验活动。

(二) 各级实验学校创设成立

当局与内迁的研究院所在大后方各地建立了各类实验中小学、实验班与实验训练班,广泛开展各类实验。1938年,设5所边疆实验小学,1940年度增设15所^{[8]30}。中央大学教育心理研究部创办中学心理教学实验班,挑选天资聪颖的儿童,完全采用试验方法施教。经实验,发现国文文章内容、学生个性等都与背诵学习有关系,这对国文教材的选定有了依据与把握^[25]。“国立社会学院”附属中小学与师范学校都担任了一定的教学实验任务。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也先后在沙坪设立多所实验小学,以从事相应的实验工作。

此外,当局还在后方各地创设各类实验教育训练班,训练各级学校教师学习各种新式教育方法,以推行全国。如,推行卡片识字教学,缩短学习时间,提高儿童学业水平,改良教学方法等。当局曾在汉口与重庆举办训练班,将受训学员分别派往川鄂桂黔各省开办实验班,以实验该项教学方法。教育部与四川省教育厅重庆市政府及省立重庆女师附小、川东联立师范附小、私立巴蜀小学等校接洽,派遣学员前往开办实验教学班,推广实验^{[26]332}。除办理实验班外,还令湖北省教育厅在恩施设置卡片教学法实验小学两所,在重庆青木关设置中心小学,采用卡片教学方法,以便积极推进此项实验工作^{[22]170}。

(三) 有针对性地开展实验教育

在重庆期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委托,中央大学教育心理学部和中国教育心理研究所对西南各省小学生学力调查实测,对湖北、贵州、四川三省十万大中小學生开展测验。如各地、各校间学生能力的比较,男、女学生能力的比较,以及这些能力相互间的关系。还通过对中小學生体格检验,比较体格发育与智慧、学力之间的关系^[25]。此外,1941年秋,艾伟接受教育学会理事会委托,对重庆迁建区小学生智力学力进行调查。1942年夏,艾伟等修订完成《实特勒(R. Pintner)氏幼童团体智力测验》,用此作

为小学五六年级及初中各级智力测验、国语默读测验、算术基本习惯测验、算术应用题测验、社会测验、学力上两性差异测验、小学常识与自然测验^[27]。通过问卷、测量、调查方法来收集相关数据,注重教育方法改良与效率的提高,采用观察统计和实验来补充旧有的研究方法,对提高各级教育质量与效率有重要的意义。

(四) 各类实验教育刊物应运而生

各类实验教育材料与刊物在此期间大量刊发印行。实施实验教育亟须编辑教材。为此,当局在第二期实验教育训练班毕业学员中遴选十人编辑实验教材,以推广教育实验。各教育机关也发行一些实验教育书刊,以中央大学教育心理学部与“国立社会主义学院”为例,两校先后刊行十余种实验教育刊物。“国立社会学院”为推进实验研究,先后编撰丛书、季刊、编辑民众读物、补充读物、社会教育辅导丛书多种^[28],还发行各类实验教材与调查报告。这些刊物刊载了实验教育的推行及其结果,“对这些问题全用实验方法,用心理学和统计学剖制而成,这些是纯粹合乎科学条件的。”^{[26]332} 这些刊物以及各类学术丛书、专刊、实验调查报告对“社会教育理论已有新的建立,社会教育方法与教具也有新的改善与创制”^[11],说明理论界已经将实验教育纳入研究视野。这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表成果、宣传运动、获取社会支持的平台,也推动了教育实践领域内的改革,推广了实验教育研究成果。同时,这也是一个有关实验教育交流与传播的渠道,有利于实验教育学术传播。

在大后方设置的这些实验教育研究机构,通过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建立各类教育实验示范区,极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唤起了大后方民众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在改进学校教育、推广社会教育、创设教育研究机构、培养各级师资、领导与促进地方教育、激励民众抗日救国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这些实验教育机构设立的背景动机各异,实施实验教育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但这些实验活动为教学、科研提供了施展舞台,充实扩展了教学科研内容,普及传播了实验教育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陪都重庆乃至大后方教育教学方法的改进,也在一定程度改变了战前西部地区教育落后的状况,而陪都重庆由此成为国统区实验教育的中心,促使先进的教育理念播撒到西部腹地。这是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也是大后方教育能够得以开展的重要前提。

三、战时实验教育的特征与缺失

实验教育注重实验,对破除教育成见,鉴别教育方法的优良,培养研究精神都有积极意义。具体而言,战时大后方的实验教育呈现出以下明显特征:

(一) 注重实践是其立足点

实验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是战时大后方教育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各院校及教育团体在正常教学科研之余,通过多样化方式开展实验教育。“注重实践,使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不再是死读书,读死书。”^[29]“中国实验教育应该针对现实。……以为中国本位教育,尤其是教育中心的社会建设辟出一条新生的道路!”^[9]该时期的实验教育,一方面适应国难时局的现实需要,为实际教育问题寻求理论上的学术基础,为社会现实问题推求变化;一方面对过去与现有教育开展批评与检讨,重新估定其价值,并对教育本质、教育意义做了综合性研究。这说明集体意识和有组织教育已受到重视,一反之前个人自由主义的教育。大后方实验教育不仅培养了各教育机构的服务、奉献精神,而且还促进了教育学术的发展,增进了教学研究机构与社会的联系。

(二) 扩大教育对象是其最显著的成效

总体而言,战时实验教育扩大了教育对象,实现了从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自全面抗战以来,随着各项实验活动的展开,施教机关、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实施实

验教育的机构与人员大为扩大,有教育部、专科及其以上学校、社教机构、公私立教育团体;施教人员由学校教师、一般社教人员而推至一切知识分子,而男女老幼全体民众都网罗在实验教育之内,成为实验教育的施教对象。“社会教育为新兴的教育事业,教育对象广泛、使命重大,如何设施,方能收效,实为一种亟需研究实验之问题。”^[29]战时的实验教育配合社会现实需要,适应民众生活的要求,使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生活化特征。即将传统教育的范围从横的方面加以扩大,纵的方面加以延长,改变施教方式,充实施教内容,使教育在本质上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时,它向民众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开启了民智,使普通民众受到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洗礼,提高了民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三)救亡图存是其最高目标

抗日战争在改变其时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与格局的同时,也使其时中国教育获得了新的转机,为中国教育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如何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使教育的永久性与时代性有效配合,成为其时实验教育开展的前提与研究对象。各实验教育机构一方面着眼于对以教育学术为根本的综合研究实验,另一方面也加强对现实教育问题的研究实验,特别注重对于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理论与实施技术的研究与实验。其时,以“国难教育”“非常时期教育”“抗战教育”“民众教育”等为主题的著作出版甚多。教育的目的、方针、计划和政治目的、方针、计划渐趋一致。教育已逐渐和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相一致,“民族意识及国家观念,已得到高度的发扬。”^[18]通过实验,“统筹大中小学的教育,以借用、迁移、改革为方法,全盘考虑中国的教育制度”^[30],其目的在于为国家陶铸抗战救国的忠勇战士,充实民众的基础知识,灌输民众的抗战常识,训练民众的抗战技能,增强民众的生产能力,坚强民众的抗战意志,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如中华平民教育会之农民抗战教育团、教育部社教工作队,这些机构在大后方巡回施教,流动教学,参与战时民众动员,加重了教育的任务,增添了许多与宣传及组织所用的材料与方。总之,在战争环境下,实验教育在更多层面高扬救亡和启蒙的主旋律,提高了大后方民众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战时动员与全社会抗战氛围的形成,增强了民众对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四)战时实验教育的不足

全面抗战时期,教育部及各类教育机构在大后方各地开展了名目繁多的实验教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当局对实验教育缺乏整体规划,各研究机构与研究团体缺乏有效的分工与合作。实验教育的推行须结合当时教育的现状与社会的需要、衡量利弊,召集专家与学校当局共同研讨制定周全的实施计划,按步骤推行,才能收到实验教育的效果。然而,大后方的实验教育未能形成一个有机的实验体系,各机构未能进行有效分工与合作,以至于出现较多人力物力的浪费。此外,当局对于新教育的实验,或专家个人在教育科学上的拓荒,其扶持奖助有限。

其二,有效的实验结果缺乏推广应用。由于缺乏分工合作,通过实验研究出来的有效且简单易行的结果,未得到充分利用或未能有效推广。中央大学教授艾伟曾表示,“怎样应用科学的方法举办大学入学实验和研究生入学实验,我们在最近五年中不断的研究曾经获得可靠的结果。将这些结果贡献于考试委员会是不会采纳的。至于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看了我们的报告以后,则认为和他们的研究相符。在入学实验中他们是早经实行那些方法的。”^[26]实验虽然有效,应用却未普遍,也就失去了实验的目的。当然,由于各实验教育机构的设立背景动机不同,实验教育发展状况也参差不齐,实验教育活动范围也无固定标准,开展成效也有较大出入和区别。

其三,部分实验教育,有“实验”之名,无“实验”之实。除少数实验学校成效显著,而能实行真正科学的可控制的实验工作的机构不多。实验学校的设施,未必为实验教育所用,而为实验教育努力的未必为实验学校,故实验学校与实验教育不可相提并论。此外,实验学校多设于都市,实验教育在乡村推行不多,这些原因都限制了实验教育的推广与实施。

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国民政府及其教育当局回迁南京,以及东部高校与教育机构的相继复员,许多在大后方从事教育实验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回迁,各教育研究机构的人员、设施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实验教育中心再次发生转移,相关实验工作不了了之或虎头蛇尾。此外,受制于时局动荡、经费短缺、人力不济、督导不力等多方面原因,实验教育及其学术研究难免遭受冷落,其成效更是受到较大影响,各类实验教育在低迷状态中逐渐走向衰落,战时在大后方广泛开展的实验教育由蓬勃而趋于消沉。

四、结 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区及周边高校、教育研究机构西迁,实验教育中心也转向大后方各地。在国民政府教育当局的助推下,这些教育机构积极以教育应对国难,在动荡的时局中改善推进教育实验工作。在“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下,推行“国难教育”“救亡教育”“民族复兴教育”,有效发挥了教育服务于抗战与战时社会的重要作用。战时实验教育较平时教育更能针对时需,检正弱点;也能结合战争环境与大后方现实需要,开展一些针对性的教育实验,对推进义务教育、民众教育及大后方教育整体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总体而言,这些教育实验使大后方各级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教育系统更加完善,接受教育培训的民众更加广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战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高校与教育机构的相继复员,实验教育中心再次发生转移。但无论如何,战时大后方实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成绩和历史作用不容忽视与否定,其作为我国近代教育发展中的一段重要内容,是西部教育现代化历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总结这段历史,对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对标新质生产力对创新型人才的新需求,系统建构教育数字化赋能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31],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及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均衡发展均有一定的借鉴与启发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李鑫. 华西实验区卫生建设研究[D]. 信阳:信阳师范学院,2023.
- [2] 谢健. 抗战后乡村建设的复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15.
- [3] 孙益. 当代中国教育学术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
- [4] 赖(拉)依(W A Lay). 实验教育学[M]. 金澍荣,黄觉民译. 重庆:商务印书馆,1938.
- [5] 罗廷光,王秀南. 实验教育[M]. 南京:中山书局,1933.
- [6] 一九三七年以来之中国教育[J]. 教育通讯,1947(09):11-16.
- [7] 欧元怀. 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J]. 中华教育界,1947(01):7-15.
- [8] 教育部. 一年来教育部重要工作概况[M]. 内部资料,1939.
- [9] 津人. 中大指南[M]. 重庆:北斗书店,1944.
- [10] 王秀南. 十年来中国实验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 中华教育界,1947(01):71-82.
- [11] 陈礼江.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设立趣旨及办理方针[J]. 教育与社会,1942(创刊号):4-5.
- [12]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组织大纲[J]. 教育与社会,1942(创刊号):4-5.
- [13]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研究实验概况[J]. 教育与社会,1947(04):7-8.
- [14] 张建中等. 中国战时首档案文献战时教育[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5] 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M]. 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
- [16] 四川省立教育科学馆正式成立[J].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01):18-19.
- [17] 李蕾. 新教育的实验:学生营[J]. 民意周刊,1938(38):13.
- [18] 顾毓琇. 抗战七年来之教育[J]. 文化先锋,1944(23):4-12.
- [19] 洪深. 抗战十年来中国的戏剧运动与教育[J]. 中华教育界,1947(01):49-61.

- [20] 青木关实验民众教育馆概况[J]. 社会教育辅导季刊,1945(04):2-3.
- [21] 第二届高级师范教育会议概述[J]. 教育与学,1940(04):10-13.
- [22]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革命文献第58辑抗战时期教育[M]. 台北:兴台印刷厂,1972.
- [23] 陈礼江.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五年来之回顾[J]. 教育与社会,1946(1-2):9-12.
- [24] 庄泽宣. 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J]. 中华教育界,1947(01):3-6.
- [25] 艾伟. 关于抗战八年来国内教育心理研究的进展[J]. 教育通讯(汉口),1946(04):9-10.
- [26]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民国文献类编(教育卷第656册)[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 [27] 艾伟. 重庆迁建区小学学生智力学力及体力调查报告[J]. 1944年中国教育学会年报:22-24.
- [28]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研究实验概况[J]. 教育与社会,1947(04):25-27.
- [29] 白桃. 抗战三年来之教育[J]. 中苏文化杂志,1940(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5-7.
- [30] 薛平,龙其林. 议题设置与国族共同体构建:淞沪会战时期《大公报·临时晚刊》的难民报导研究[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2):97-104.
- [31] 罗瑞志,杨如安.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教育数字化赋能创新型人才培养[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42-46.

A Study on Experiment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Rear Areas during the All-Out Anti-Japanese War

Luo L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ll-out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moved its capital to Chungk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various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so moved to the rear areas with Chungking as the center.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national crisis, the educators gathered in the rear area combined various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with the idea of “education to save the country”, restored and originated relevant books and newspapers, established various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strove to practice various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with the national crisis developed. In the rear area, all kind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were vigorously carried out, fruitful results were achieved, and Chungking became the center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After the war, with the relocation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to Nanking, relevant people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lso moved back to their hometowns, and some of the experimental education content was unfinished. By comb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which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hange and educational reform, but also enrich the research of modern education history, and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existing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verall development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the All-out Anti-Japanese War; the rear areas; experiment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刘力]